



XINHAI GEMING
YU ZHONGGUO JINDAI JIAOYU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论文集

田正平 程斯辉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论文集

田正平 程斯辉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
论坛文集 / 田正平,程斯辉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2.9

ISBN 978-7-308-10610-8

I .①辛… II .①田… ②程… III .①辛亥革命—影
响—教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G5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5324 号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文集

田正平 程斯辉 主编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9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10-8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代序/田正平	1
--------------	---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科举革废与辛亥革命/刘海峰	3
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田正平	13
从中间人物看辛亥革命教育改革的意义/王建军	29
女子教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熊贤君	34
“储才”与“新民”并重,“民智”与“民心”共成 ——辛亥革命后“社会教育”的历史经验/王雷	44
辛亥革命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建立 ——写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与河南大学百年前夕/李申申 王世广	54
辛亥革命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嬗变及其历史影响/朱志峰 王凌皓	63
从《〈看护学教程〉绪言》看秋瑾的女子教育思想/王慧 胡燕	72
多重逻辑下的教育冲突:民初广东教育改革的历史考察/熊文渊 王建军 ...	79
论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曲铁华 李彩玉	96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与民初教育改革/于潇	103
绍兴学界与辛亥革命 ——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吴民祥 张金超	113
孙中山在港接受英文教育的学堂:马礼逊学堂的英文教育/张伟保	123

史观与方法

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张斌贤	140
-----------------------------	-----

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新方向:教育活动史研究/周洪宇	153
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周采	170
由实体转向关系:教育史研究探微/闫广芬 许衍琛	179
从教育学图像历史发展解读新教育学之价值与特性/吴家莹 何意中	188
论革命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刘来兵	205
论“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武翠红	214

视野与问题

检讨中国教育西化成效的新视角:海峡两岸百年西化历程	
的比较刍议/周愚文	224
大学核心理念——历史的视角/贺国庆	245
近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传播与民国德育观念的变革/肖朗 田海洋	259
小学道德教科书中“班会”的百年考察	
——从大陆时期(1911—1949)到台湾现况(1950—2011)/方志华	274
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活动中的作用探析/蒋明宏	289
初探台湾教科书研究趋势(1956—2010)/张芬芬	299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之初步分析	
(1914—1959)/刘蔚之	319
从政治教育学到民生教育学/程斯辉 李中伟	337
民国高校学业竞试的实施及启示/郑若玲 吕建强	357
以教促政:民国时期山西社会教育研究/申国昌	367
边纳尔改革教育学之探究/梁福镇	379
从教会事业走向国家事业	
——英格兰民众教育发展的历史路径探析/朱镜人	392
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	
——朱熹门人在福建的教化实践/陈俞志	402
严复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和启示/张翼星	412
“孔虽旧教 其意维新”	
——陈焕章的儒教观及其教育影响/张亚群	423

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陶行知

——《陶行知年谱长编》编撰手记/周洪宇 刘大伟 433

附 录

会议论文目录 442

编后记 446

在“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 开幕式上的致辞(代序)

田正平^{*}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在这举国上下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在这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校园,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开幕了。此时此地,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意义!感谢武汉大学校领导及学校各部门对会议给予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感谢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师生为这次会议的顺利举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整整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更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起点和重要里程碑。

一百年来,“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成为教育学术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辛亥革命为传统教育的变革、为现代教育的建立开启了无数法门,举其大端,如,主张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反对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主张教育方针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反对用一个人主义或一部分人主义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主张信仰自由、反对思想僵化、定于一尊;提倡受教育者五育并重和谐发展,反对压抑个性、摧残学生;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促进个人发展功能的全面发挥,反对对教育功能的片面张扬;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创新,使得中国教育界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各种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等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既有凯歌高奏的欢欣,更有迂回反复的痛苦,现在回过头来思考,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是失败的教训,几乎都与是否紧紧把握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教育现代化的上述大方向有关。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举行纪念活动,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这一话题,正是试图站在 21 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和中国教育发展的新高度,重新审视

^{*} 作者简介:田正平,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

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梳理它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教育现代化事业仍然在继续,辛亥革命时期所提出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有理由、有责任让这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变得历久弥新!

各位同仁,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教育史学科建设和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创新及中外教育史研究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是第三、四两届教育史论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学科建设永远是一个与学术共同体内从业人员息息相关的话题。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下,既有赖于它的从业者的努力,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从业者个体水平的提高。对于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和不断探索,是我们教育史学科获得发展、提升的重要条件。

让我们群策群力,把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同仁身体健康!

科举革废与辛亥革命

刘海峰*

摘要: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对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关联。20 世纪最初 10 年中国的启蒙宣传是辛亥革命的先导,在开启民智、普及西学方面,改革后的科举考试起过重大的作用。由于科举具有非常强大的以考促学的功用,通过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人的学习中心迅速从传统的中学转移到中西并重,特别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知识的引进和推广,发挥了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废止科举动摇和颠覆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导致知识分子从社会政治中心退居边缘,对政府的向心力大大降低,部分人走向行伍,直接间接地对辛亥革命的发生产生影响。

关键词:科举;废止;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就教育而言,民国元年以后的中国教育有着明显的新气象、新风尚。探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关系,学者多从辛亥革命以后的教育着手,谈革命对教育的影响,较少涉及清末教育改革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在 1901 年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废止于 1905 年,辛亥革命发生在 1911 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却有着重要的关联。本文着重论述过去很少关注的清末科举革新与近代启蒙宣传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先导,并谈谈科举废止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一、清末科举革新与近代启蒙宣传

推翻帝制的革命不会凭空发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或者说需要相当范围的思想启蒙。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便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18世纪上半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就已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启蒙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拿破仑之所以会说“大革命是思想家的业绩”,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启蒙宣传的威力。^①

法国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同样,20世纪最初10年中国的启蒙宣传也是辛亥革命的先导,而在开启民智、普及西学方面,改革后的科举考试起过重大的作用。过去已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②而改革科举,便是“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上光绪皇帝《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便提出废止八股改试策论,而改革后的策论,要求“明中通外”,范围包括了外国,即西学方面的内容。当时人便说:“古之策论,不外中国得失,而今则试以五洲得失。且不外中国学问,而今则试以五洲学问。”^③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六月初一,礼部颁布了《遵义乡会试详细章程》,规定:“第一场论题五道,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第二场策题五道,凡西学中天文、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以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听考官酌举命题,不必拘定经济科专门之例。”^④于是,书商闻风而动,纷纷编纂出版相关备考书籍。例如,该年七月杭城衢樽便出版了《历代史学中外时务论》,上海出版了《时务新策》,八月上海书局出版了《洋务经济策论类编》等。

① 刘海峰:《梁启超·伏尔泰·辛亥革命》,《华人之声》1985年第33期。

② 郭世佑:《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③ 《时务论策法程》(广东张宗师岁取),序第2页,双门底九经阁,1898年。

④ 王尚清编:《皇朝蓄艾文编》卷一五《学校》二。

然而,变法失败,废八股改试策论没有真正实施。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经历过庚子事变而避居河南的慈禧太后及清朝政府,痛定思痛,感到非改革不可,于是将曾经否定过的戊戌变法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又付诸实践。该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这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颁布的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中说:“查各国政治,自以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现奉新章,以此命题试策,士子讲求时务,肄习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蕴。”^①

1901年8月下诏改革科举后,乡试和会试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1902年秋举行了科举革新后的第一次乡试,各省的乡试试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等许多方面,已经朝现代文官考试转化。清末最后几科科举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这些策问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新政改革出谋划策。^② 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其改革的幅度之大,变动之剧烈,足以用“变革”称之。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③ 这些改革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乡试与会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和体现。

科举具有巨大的以考促学功能。科举革新后,广大的读书人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改习新学,出版商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大量以新学为内容的应试资料,而且非常畅销。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八月初五,内阁钞出七月十六日关于变通科举的上谕。秋七月,上海书局便编纂出版了《中西时务新策汇编》。九月,湖南书商便选编出版了《精选新政应试必读六种》,内中各册标明“新学新政通考”,包括中国政治、中国史事、各国艺学策论等。当时还有许多在书名中标示出“新政”的应试备考的书籍,如光绪壬寅(1902年)暮春上海书局石印本《江苏新政新科考卷》、光绪壬寅(1902年)夏上海书局石印本《新政

① 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北京,礼部、政务处,1901,第4页。

② 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

③ C. H. Lacey Sites, C. H. L.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Special Educational Number, June, 1904, pp. 62—72.

应试分类必备》，共8册；光绪壬寅（1902年）京师新政学会印行《中外政治艺学策论》6册。光绪癸卯（1903年）仲春上海书局石印本《壬寅科变法直省闱艺》一书，扉页直接题为《壬寅直省新政闱墨》，收有12个直省癸卯科考试题目与部分范文。还有许多戊戌变法时编纂的中外策论书籍被重印出来，如1902年春，观澜书局便重印了1898年编好的《中外艺学新策》。

废八股改试策论，“恢奇特达之彦，咸奔走相告，谓我中国之经济学问，皆将以此起点”，而且可以“昌文运、开民智”。^①当时朝野都认识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将迅速引导学问的转向。1901年秋出版的《精选新政应试必读六种》序文中说：“朝廷锐意求贤，厌弃制艺之空疏庸滥而无用，于今海内儒林竞习经世之学，于是乎诏试策论而辅之以四书五经义。盖将使之有体有用，洞中而达外，博古而通今，得其才足以经国家平天下，非所谓去故而更新者耶！独是承学之士，往往讲求新学。”^②此类备考书籍发行量往往很大，出版商也估计和期望举子人人购买。1902年新印《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的编者便说举子“苟能家置一编，简练揣摩，临场默运自得，左右逢源”^③。“游遍五洲人”为《中西时务新策汇编》所作序文中也说：“吾知此书一出，定当户置一编，简练揣摩，以为投时利器，即有裨于士林，实非浅鲜。”^④可见科举新政一出，上行下效，有如影响，对西学起过重要的推广作用。

罗志田在研究清季科举改革的社会影响后指出：“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⑤还有学者认为，清末参加科考的数十万士子在“问策”导向下所作“应策”，呈现出知识阶层一般的思想状况。改试策论除为西学大开方便之门，也摧毁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架构，策问资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知识的传播及知识的“再生产”上，也另有

① 林迪臣：《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文汇书局1901年版，序第1页。

② 顾厚琨鉴定：《精选新政应试必读六种》，中西译书会1901年版，邹福保序第1页。

③ 益生：《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上海书局1902年版，序第1页。

④ 游遍五洲人：《中西时务新策汇编》，上海书局1902年版，序第1页。

⑤ 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一功。^①

我们试以最后两科湖北乡试第二场的试题和部分举人的答卷为例,来具体分析科举改革对推广新学的作用。壬寅科(1902年)湖北乡试首场试题中有:“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论。”次年(1903年)正月典试使者宝熙、沈曾桐鉴定出版的《湖北闱墨》中,此题下收有8位举人的试卷。另外一论题为:“强国之道,财政为先。试取泰西理财之法,参以中国情势,通盘筹画,分别其缓急利病之宜以浚利源而裨国计论。”此题下也收有6名举人的答卷,多数都说得头头是道。以上两道是关于教育和财政的论题。

壬寅科湖北乡试第二场有五道策问题,分别为:各种政体利弊、日本新政及其借镜、限制洋教、算术几何、东西方政艺之书翻译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道策问题目:“俄主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政策之宗旨不同,国民之感动顿异,试抉其利病得失之数策。”^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策题,因为直接请举子比较论述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的利弊得失,作为还在实行帝制专制而试图准备探索立宪体制的政府,此题有相当的现实性,但也十分敏感。《湖北闱墨》在此题下收有6位举人的试卷,其中第四名举人张国溶的答卷中就指出:“俄不能变专制之权,英不能紊立宪之权,美不能废共和之权者,势也。专制行而君重,共和行而民重,立宪行而君民皆重。”^③也就是说,专制与立宪各有好处,但立宪体制兼有两者的好处。第五名陈曾矩的答卷最长,也是力主立宪,但也指出:“有谓天下者,以众人之盟约而成,此法人卢梭之说,而无君党之原理也;有谓民者本主治之人,而仍自居于被治之地,此今日代议民主政也;有谓君之与民,皆为宪法之所管制,此今日立宪君主政也。”^④

而后来与辛亥革命关系至为密切的汤化龙,在该科湖北乡试中第十四名举人,他在此题的答卷中指出:“若英则南非一战,弩末而已。……故于俄英美三国之政策,择善而从,可也。”^⑤他认为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各有得失,自己没有提出明确主张,这在准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中,是颇为特别的。汤化龙后来于1904年的甲辰科中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1906年东渡日

① 章清:《“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007年,第58辑。

② 《壬寅科变法直省闱艺(壬寅直省新政闱墨)》,上海书局1903年版,总目录第1—8页。

③ 宝熙、沈曾桐鉴定:《湖北闱墨》1903年,第44页。

④ 宝熙、沈曾桐鉴定:《湖北闱墨》1903年,第46页。

⑤ 宝熙、沈曾桐鉴定:《湖北闱墨》1903年,第47页。

本入法政大学学习。他组织能力强,且文笔雄健,在日本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倡导中国教育改革。1908年回国,1909年当选为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复被举为议长。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即时应变,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咨议局响应革命(一说通电系革命党人借其名所发)。他曾于1914年担任过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汤化龙是一位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进士,也是一位与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有过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辛亥革命会首先在武昌发生,汤化龙会成为与革命关系密切的人物,不能说与科举革新开启民智没有一点关系。

1903年,各省都举行了中国1300年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乡试,即癸卯科乡试。该科湖北乡试第二场有一道关于教育的策试题:“泰西小学教育之旨,斯巴达雅典,宽严异尚,教育名家,或主家庭教育,或主学校教育,或主体育、智育、德育诸义。孰得孰失,宜融会贯通,折中至当,以端蒙养之基策。”^①另一道是关于法律的策问题:“日本自改修刑律后,收回治外法权。近朝廷以交涉日繁,酌定通律,如矿律、路律、教律,实为今日之急务。亟应参考中外章程,分撮旨要,以备采择策。”^②其他三道是关于水师、印花税、史地方面的策问。

从以上这些试题和当时举子的试卷可以看出,改革后的科举与传统的科举已经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改变。如果对西学不熟悉,根本就不可能考好。而由于科举具有非常强大的以考促学的功用,通过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人的学习中心迅速从传统的中学转移到中西并重,特别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知识的引进和推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为普及新学(西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辛亥革命的发生作了思想启蒙和文化铺垫。虽然科举尚未完成其转型便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但清末科举革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1300年中国科举史留下了一个亮丽的结尾。

二、废止科举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如果说清末科举革新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启蒙和文化准备的话,那么,废

① 《评选直省闾艺大全》,上海书局1905年,目录第10页。

② 《癸卯直墨采真》,焕文书局1904年版,目录第7页。

止科举则使传统社会失去了制度支柱,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生。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才四个月(1906年1月),洞悉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便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①当时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很难准确判断,但他已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结果6年后国家体制果真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动,不仅满族统治被推翻,而且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帝制走向终结。

科举制废止后,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也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②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随后不久他便于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不久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确实相当“可骇”。

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③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④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开科取士诏便说:“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⑤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信等同于自然界白天黑夜的变化。这么一个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国家抡才大典一旦废止,造成的社会 and

①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

②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总24014页。

③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2页。

④ Waltner, A. "Building on the Ladder of Success: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nd Recent Work on Social Mobility," in *Ming Studies*, 17th, Fall, 1983, p. 30.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年。

化地震当时看虽然不很强烈,但其影响却是深远和巨大的。

从 1898 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 1905 年 9 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原计划在 1911 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 1905 年实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飭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未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①丙午科是原定於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近年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已谈到科举废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 1905 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 1861 年沙俄废奴和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萧公秦认为:“在科举废除之后,清末民初的都市中与各省充满了大批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富有理想而又在现实生活中备感绝望的处于‘游离态’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科举制度取消所产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正是这些在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③

① 《光绪政要》卷三一,《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② [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5、635 页。

③ 萧公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4 期。

有不少学者认为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①。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所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后,持续了两千年的帝国体制也随即全面崩解了。”^②此外,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和《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杨天宏《科举制度的革废与近代军阀政治的兴衰》(《学人》第十五辑,2000年4月)等等,也都论述过废科举导致知识分子从社会政治中心退居边缘,对政府的向心力大大降低,部分人走向行伍,直接间接地对辛亥革命的发生起到影响。

科举废止与辛亥革命表面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互不关联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复杂而重要的联系。过去,科举年复一年地举行,士子年复一年地应考,周而复始,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人们都习以为常。一旦科举真的废弃,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很难适应,失落感和幻灭感是非常强烈的。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遭到颠覆,必将使这些人陷入困惑、彷徨和幻灭之中。由于经过一个阶段的舆论准备,到1905年真正废止科举时,整个社会表面上十分平和,没有激起什么反弹。掌握报刊等传播媒体的都是新学人士,人们听到的自然都是赞成的声音。而一批士人对废科举感到绝望、“心若死灰”的情形,后人只有从个别士人流传下来的日记中才能窥见一二。^③即使是主张废科举的人士,到后来才发现科举制的废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④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⑤并极力想创办存古学堂

① 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4、160页。

② 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

③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

④ 刘海峰:《科举制百年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4期。

⑤ Ayers, W.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4-245.